

中国文库

· 文学类 ·

懒寻旧梦录

(增补本)

夏衍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中国文庫

（文学部）

懶尋旧梦录

（增订本）

王德信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（北京）

中国文库

文学类

懒寻旧梦录

(增补本)

夏衍著

中国出版集团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懒寻旧梦录：增补本 / 夏衍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5.1

(中国文库)

ISBN 7-108-02222-2

I. 懒… II. 夏… III. 夏衍(1900~1995)—回忆录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7409 号

责任编辑：郑 勇

整体设计：翁 涌

责任印制：董文权

懒寻旧梦录(增补本)

Lan Xun Jiumeng Lu

夏 衍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：100010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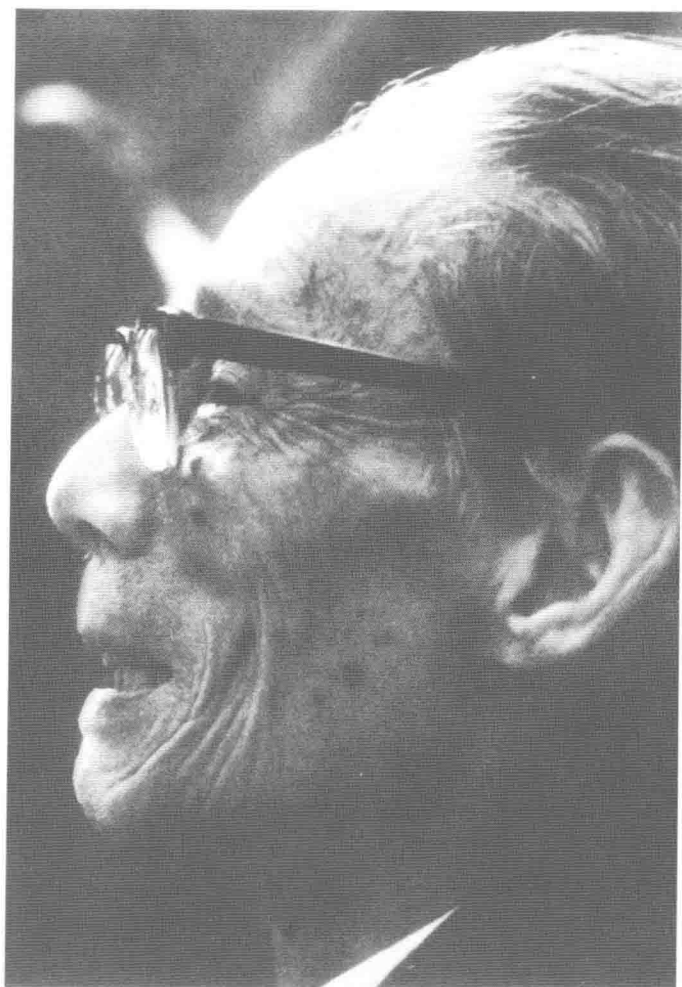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14.5

字数：347 千字 印数：1-4500

ISBN 7-108-02222-2

定价：32.00 元



作者像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(1)哲学社会科学类(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)；(2)史学类(通史及专史)；(3)文学类(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)；(4)艺术类(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)；(5)科学技术类(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)；(6)综合·普及类(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)；(7)汉译学术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)；(8)汉译文学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)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

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东生
李从军 宋木文 徐惟诚

主 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丁一平 丁亚平 艾 东 龙 杰 卢锡铭 田胜立
吕建华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玉 刘国辉 杨德炎
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张伟民 张树相
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贺圣遂
贺耀敏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赖德胜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 员：（按姓名笔画为序）

于殿利 刘晓东 孙延凤 李 岩 李师东

李济平 陈有和 汪家明 程大利 管士光

出版编务组：

陈鹏鸣 仵永成 杨 静 李红强 孙 牧

乔先彪

自序

上了年纪，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，这也许是人之常情。

六十岁以前，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，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，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，但除了1939年写过一篇《旧家的火葬》之外，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，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：写文章尽可能“少谈自己”。

我认真地回忆过去，是在1966年冬被“监护”之后，我记得很清楚，1967年5月1日，“专案组”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，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止的“自传体的交代”，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，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，就被叫去“问话”，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：“不行，得重新写过，要你写检讨，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。”我记得这样的“交代”前后写过三四次，后来才懂得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是要从“交代”中找到“外调”的线索，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“交代”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，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。这是一种恶作剧，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。

在这之前，我从来不失眠，也很少做梦；可是也在这个时期，一入睡就会做梦，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年时期的旧事，梦见我的母亲，我的姊姊，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。每次梦醒之后，总使我感到惊奇，事隔半个多世纪，为什么梦境中的人、事、细节，竟会那样的清晰，那样的详细！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，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，而梦境中听到的，却是纯粹的杭

州上城口音。

当时写“交代”，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，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。那时批斗猛烈，审讯频繁，既不敢说真话，也不能说假话，因为说真话会触怒“革命派”，说假话会株连亲友。全国解放后，我经历过许多次“运动”，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“斗争经验”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，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，不暴露真实的思想。

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，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，那是在1971年“林彪事件”之后。从1973年3月到1975年7月，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，不是说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么，我就利用这一“安静”的时期，对我前半生的历史，进行了初步的回顾。这像是一团乱麻，要把它解开和理顺，是不容易的，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，写过的每一篇文章，分辨出是非曲直，那就更困难了。任何人都有主观，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，1966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，“革命小将”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“我有罪、我有罪”的歌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，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“游斗”、拳打脚踢、无休止的疲劳审讯，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一是，真的是应该“低头认罪”了，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，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，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。

从“交通干校”转移到“秦城监狱”之后，获得了很大的恩典，准许看书了，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。这时我的右眼已近失明，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，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，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。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不受干扰，可以边读边想，边联系中国的实际。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，而这时候读，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，才

觉得“渐入佳境”，别有一番滋味了。

可惜这一段“独房静思”的时间太短了，1975年7月12日清晨，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：“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”，即日解除“监护”。我感到意外，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：“关了八年半，批斗了几年，要解除监护，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。”对方蛮横地回答说：结论还没有，但可以告诉你，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这时，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，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，都在等着你，先回去吧，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。

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，当然是高兴的，但在当时，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，审查还没有结论，“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”，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“从宽处理”的“敌人”。监护是解除了，但“监视”则一直没有解除，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在巡视，后来有人告诉我，有一个40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，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“小报告”。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，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，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，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，承志的乐观，一氓的安详，给了我无穷的勇气。廖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：居然还活着，这就好！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。

春天来得很迟，严冬过去之后又碰上了春寒，1976年1月，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，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，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，我这个人铁石心肠，很少流泪，这一天，我不仅流了泪，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。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。说实话，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，我是逃不过1957、1959、1964年这些关卡的，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。我静下心来读书，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。条件比以前好多了，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，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

命历史的书，有中国人写的，有外国人写的，有同情中国革命的，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，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、不敢看的书，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。我没有浪费时间，从“天安门事件”之后到1976年秋，我一直闭户读书，从实出发，又回到虚，从看史书出发，又回到了哲学。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，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《自然辩证法》。这本书我20年代就读过，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，可是现在再读，感受就很不一样了，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，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，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，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！这就是公式主义、本本主义、教条主义，也就是唯心主义。

恩格斯说过：“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，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，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，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。”这里所说的对立面，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。

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者，他说：“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，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，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，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，就是说，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，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。……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，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，于是，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。”——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！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30年代的那一段历史，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？就在《自然辩证法》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：“的确，蔑视辩证法，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。”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，我想，我们民族、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。

1977年秋，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（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），这样，我的“问题”得到了解决，恢复了组织关

系，也真巧，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。

在“文革”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，一件是1928年的“革命文学论战”，另一件是1935年至抗战前夕的“两个口号的论争”。因此，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“左翼十年”的往事。对前一个问题，我的立场是站在“创造社”和“太阳社”这一边的，但当时我还不是“文艺工作者”，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，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《中国文艺论战》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。而第二个问题，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，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，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，可是一方面“四人帮”遗毒还没有肃清，“文革”之前、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、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“左翼十年”的文章还在流传，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，那么，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30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，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、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、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，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，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。“左翼十年”，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起至1937年抗战为止的十年，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，现在，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，国内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，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。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“左翼”文化运动的人，潘汉年、钱杏邨、茅盾、冯乃超、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，幸存者已屈指可数，因此，在1980年纪念“左联”成立五十周年前后，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，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。

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，其实，我出生于19世纪最后的一年，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，从1900年到现在，八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这

个人很平凡,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,实在是太伟大了。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,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,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,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,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,迷失过方向,摔过跤,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。经过回忆和反思,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,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,经受过的经验教训,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,供后人参考的必要。亲身经历过的,耳闻目睹过的记述,应该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“材料”真实一些,但我能够做到的,也只能是“力求”做到而已。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,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,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,对几十年前的往事,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,具体的细节(时日、地点等等)就难免会有差错;二是“交游零落,只今余几”,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,健在的已经不多,要核实或查对往事,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;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,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“为尊者讳”、“为亲者讳”的问题。这本书是从1982年暮春开始动笔的,断断续续地花了一年多的时间,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,大概只占三分之一,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,对此,唐弢、丁景唐、方行、常君实、李子云、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,出了不少的力,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,还承内山嘉吉、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,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“左翼十年”,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,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“讳”、哪些不该“讳”的问题。这一章写完之后,曾请几位“左联”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,作过几次修改,但就在这个“讳”的问题上,意见很不一致。有的同志说:这些都是陈年旧账

了,不说也罢,说了会使当事人(或他们的子女)感到不快;也有人说: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,“我们歌,我们哭,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”么,明知其有,而加以隐讳,也就是失真。惊涛骇浪的“左翼十年”中,这一类事是不少的,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,就是一个例子。1936年9月,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,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,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,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,穆木天自己也在1946年出版的《诗的旅途》中写过,因此,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,对含冤去世的故人不公道的。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“内情”完全记下来了呢?那也不是,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,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。清人章学诚说:“秽史者所以自秽,谤书者所以自谤。”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。

也正是写完了“左翼十年”这一章的时候,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:“从前心事都休,懒寻旧梦;肯把壮怀消了,作个闲人。”我非常喜欢,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。

1984年冬

目 录

自 序	1
一 家世·童年	1
二 从“辛亥”到“五四”	11
三 心随东棹忆华年	44
四 左翼十年(上)	79
1.“四一二”之后的上海	79
2.革命文学论战	91
3.筹备组织“左联”	98
4.“社联”、“剧联”等的成立	106
5.五烈士事件	120
6.《文艺新闻》及其他	132
7.歌特的文章	142
五 左翼十年(下)	147
1.“一二八”之后	147
2.进入电影界	151
3.阵线的扩大	160
4.“左联”的后期	164
5.三次大破坏	177
6.“怪西人”事件	187